

收稿日期:2026-02-20

苏轼诗词的文化符号学特点阐释

杨景春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学院,四川 眉山 620036)

摘要:苏轼有许多代表性符号,如医药、美食、绘画、书法。和这些一样,苏轼在诗词领域着力深耕,且颇有成就,诗词也是苏轼表达的符号。从文化符号学视角来看,苏轼的诗词是一套由多种文化符号构成的复合型系统。这个系统有着自己的符号生成机制,通过巧妙的符号组合艺术,传达出丰富的意象和情感、时空及意义的隐喻,表达了对广阔世界的向往和对人生的哲理思考。

关键词:苏轼;诗词;符号学;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4-0067-10

作者简介:杨景春(1954—),男,黑龙江望奎人,四川工商学院教育学院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三苏文化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4.006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如何传达信息和意义的学科,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类。符号学不仅关注符号本身,还研究符号的语境、文化背景及个体差异对符号解读的影响,广泛应用于语言学、传播学、视觉艺术、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符号学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有两位学术奠基人,索绪尔和皮尔斯。他们的理论为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符号学相关理论认为,“符号”这一概念的核心在于其携带并传达意义的能力,即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这一观点在符号学的诸多研究中均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验证。

诗词的文化符号学阐释,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对作品作深度挖掘。苏轼诗词也是由形形色色的符号组成,不仅蕴含深厚的个人情感与人生哲理,还广泛涉及社会历史、自然景物等多个层面。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出发,苏轼的诗词亦可被视为一个符号系统。这些符号,包括但不限于自然景象、历史典故、人物形象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与象征价值。它们通过苏轼独特的艺术手法被巧妙地编织进诗词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表达。通过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解读,可更加深入地理解苏轼诗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情感表达与人生哲理,为苏轼研究提供新视角,进而领略其文学艺术的独特魅力。

一、苏轼诗词文化符号的来源机制

符号来源机制指的是符号的创造和形成过程,它根植于文化、社会及个人的交互作用中。符号可以是文字、图像、声音等,它们被赋予特定意义。这些意义往往源于历史传统、社会习俗

或个人的创意表达。物源概念有多重意义,亦指事物的起源或来源,本文指意象符号的来源。

（一）以自然界植物为物源

苏轼诗词中,植物不仅是自然风光的点缀,更是哲理思考的载体。它们以独特的符号形态,映射出诗人对宇宙、人生、道德的深刻洞察。植物的生长荣枯,象征着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轮回,引导读者思考存在的意义。它们的坚韧与柔美,反映了诗人对逆境的豁达与对美好的向往,传递出坚韧不拔与温柔以待的生活哲学。苏轼通过植物符号,将自然之美与人生哲理巧妙融合,使读者在品味诗词符号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命的智慧与力量。苏轼两千多首诗和三百多首词中植物符号丰富多姿。种类之繁,目不暇接。按形态分类:有高大的乔木,有矮小的灌木,有茎长且直立困难、只能攀缘别物的藤本植物,有茎部质地柔软、木质细胞含量较少、地上部位易于凋萎或死亡周期生命短的草本植物。按用途分类:有观赏植物,有经济植物,有药用植物,有利于空气净化的环境改良植物。按植物分类学等级分类有孢子植物和种子植物。按生长周期分类有一年、二年和多年生的。植物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物群体,从学术层面来说,植物是生物的一大类,其定义和类别均基于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按生活习性或生存环境,植物可分为五大类,即陆生、水生、附生、寄生和腐生植物,据此分类法,表1对苏轼诗词作了初步统计。

表1 苏轼诗词植物分类表

植物分类	例诗			生态位符号特点
	例字	例句	出处	
陆生植物	茱萸	酒阑不必看茱萸	《西江月·重阳栖霞楼作》	湿生植物偏好湿润环境,中生植物广泛适应多种土壤水分,旱生植物耐旱性强,能在干燥条件下生存。
	芦笋	芦笋生时柳絮飞	《和文与可洋川园池》	
	棠梨	棠梨叶战暝禽呼	《宝山新开径》	
	黑黍	黑黍黄粱初熟候	《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	
	石榴	安石榴花开最迟	《首夏官舍即事》	
水生植物	水仙	抱琴欲访水仙师	《留别登州举人》	全部或部分沉于水,以漂浮叶片和通气组织适应水域,成为水质与光照条件的生态位符号。
	荷花	贺监荷花空自开	《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	
	蒲苇	翠柏如蒲苇	《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	
	菱角	只将菱角与鸡头	《南歌子·湖景》	
附生植物	苍藓	旧游到处皆苍藓	《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	附生他物但能自营,不依赖土壤,能占据传统植物无法生存的空间。
	榕	卧闻榕叶响长廊	《连雨江涨二首》	
	甘棠	便与甘棠同不剪	《送贾讷倅眉二首 其二》	
寄生植物	藤	我击藤床君唱歌	《和赵郎中见戏二首 其二》	以吸根侵入寄主组织内吸取养料,体现了生物在形成自身生态位过程中的依附策略。
腐生植物	菌芝	枯朽犹能出菌芝	《次韵吕梁仲屯田》	生于腐有机质,不依赖光合作用,与真菌共生。在生态系统中维持生物多样性与稳定性。
	菌蕈	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	《雨后行菜圃》	

从符号学角度,这些植物都是根据其生长环境或与其他生物的关系来定义和分类的。基于此,可以将它们归为一个类别,即“生态位符号植物”。从符号学角度看,生态位可以被视为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符号标识。生态位表示其在群落中的独特位置和角色,包括其占据的空

间、资源利用情况、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等,是物种生存状态、习性和环境适应性的综合符号表达。

(二) 以自然界动物为物源

从苏轼的诗词中,我们不难发现众多动物的身影(表2),它们同样承载着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这些动物也可根据其生活习性、所处环境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来定义和分类。它们同样可以被视为“生态位符号动物”,各自代表着独特的生存策略和生态位。

表2 苏轼诗词动物类别简表

类型	例字	例句	出处
鱼类	鳊	一钩归钓缩头鳊	《监洞霄宫俞康直郎中所居》
	鲫	鲜鲫经年秘醖醢	《扬州以土物寄少游》
鸟类	隼	射隼长思逐马军	《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
	鹞	泥深厌听鸡头鹞	《送牛尾狸与徐使君》
	蜂	蜜蜂未许辄先甜	《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
昆虫	蚊	只有飞蚊绕鬓鸣	《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 其五》
	麋	谢病行收麋鹿姿	《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
兽类	猿	照山炬火落惊猿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礪溪天未明》

卡西尔符号哲学思想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他从‘人是什么’出发,提出了‘人是符号的动物’的哲学,开启了人学思想的新篇章。”^[1]动物符号凭借其天生的魅力,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人们。动物符号亦是广告创意中的一把利器。动物生动灵活、鲜活可人的外貌与气质,能在诗句的流转间迅速捕获读者的目光,即便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也能留下深刻印象。此外,动物符号与诗词创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能够实现从能指到所指的符号转换,丰富诗词的内涵。同时,动物的地域特性和民族象征,更是彰显了中华诗词独特的文化意蕴。

(三) 以自然界景物为物源

苏轼诗词除了以动物、植物为物源外,还巧妙地以自然界其他景物为灵感源泉。山川湖海、日月星辰、风霜雨雪,这些在苏轼笔下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与哲理。山川的壮丽,象征着诗人的豪情壮志;月光的皎洁,映射出内心的清高与孤独;风雨的洗礼,则寓意着人生的坎坷与磨砺。

苏轼通过细腻的观察与深刻的感悟,将自然景物转化为诗词中的生动符号,不仅描绘了自然的美丽,更传达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使作品充满了诗意与哲思。因此说,其景物不仅是自然界的直接映射,更是情感抒发与哲理思考的符号载体。苏轼巧妙地变换景物描写的角度,将宏观的壮丽山河与微观的细腻景致融为一体,如《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该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十二月。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熙宁五年冬,诗人赈灾由湖州经过秀州(嘉兴),与秀州税监、屯田员外郎钱顗钱安道会面。根据《苏轼年谱》:“顗送茶。”“顗燕苏轼,令歌者道服,苏轼作诗。”另据《丹阳集》卷十:“东坡赋诗时,三十九岁矣。其末云‘安道令赋’,有旨哉!”^[2]这首诗通过对江南山水、茶文化及隐逸生活的描绘,展现了诗人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及对传统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向往,通过描绘江南山水与人文景观,展现了深厚的地域文化与隐逸文化。这首诗除了动物“龙”和植物“松”,属于自然界景物的有江、山、岸、天、月、泉、石、水、光、岭、壑、路等。《唐宋诗醇》(卷三四)评该诗“有横

绝太空之气概,洒豁襟抱,一如听苏门长啸,响动林谷”^[3]。诗中的饼茶小龙团、惠山泉已成江南文化的经典符号。

自然界其他景物还有许多,那些虽然看不见但确实属于自然界的现象或符号元素,如春夏秋冬,阴晴多变,它们虽然不像具体物体那样可以触摸或看见,但我们可以通过气候的变化感知四季的更迭,它们也是自然界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生物和地理环境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的符号色彩也很鲜明。

（四） 以社会生活人工器物为符号源

苏轼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如《汲江煎茶》描绘了诗人汲水煎茶的情景。一二句说煎茶最好取流动之“活水”以旺盛的炭火即“活火”煎煮,于是诗人亲临“钓石”处取“深清”之水。三四句写取水分水过程。在江边,月光辉映江面,“大瓢”舀水,似乎将明月装进了瓮中。五六句写煎茶时和煎好倒出时的情景。七八句写诗人饮茶的感受。全诗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诗人对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这里的“大瓢”“春瓮”“小杓”等器物,不仅是烹茶的工具,更成诗人寄托情感、抒发哲思的符号。厨房有锅碗瓢盆;禅房有青灯黄卷;绣房有针头线脑;牢房有铁镣钢窗;磨房有扫把石碾;营房有刀叉斧钺;花房有小铲喷壶。社会生活人工器物是诗词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表3是苏轼诗词社会生活人工器物符号源出现的频率汇总。

表3 器物符号源频率表

器物	帽	桥	锄	坟	书	碑	寺	廊	玻璃	蓑	琥珀	车	鼓	关
频次	34	87	18	12	438	21	201	29	10	11	6	150	140	133
器物	舟	箫	烛	帘	港	巢	扉	钵	寒砧	鞋	貂裘	鞭	庙	酒
频次	201	29	56	82	150	23	22	11	1	15	9	44	45	602

这些器物符号在苏轼诗词中频繁出现,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象和生活情境,反映了苏轼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世界。琴、棋等符号的出现,展现了苏轼高雅的生活情趣和艺术追求。就表3来看,出现频次最高的是酒,602次,第二名是书,出现438次,说明什么已经很清楚了。杖、舟、港、船、帽、鞋的出现,反映贬黜、旅行与隐逸。寺、碑、庙等宗教场所和器物的出现,体现了苏轼对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的接触和尊重。苏轼诗词共出现10次玻璃。如“老枕胜玻璃”(《荆州十首 其八》)、“浩瀚玻璃盏”(《妒佳月》)等。中国玻璃最早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距今已有2500多年。但古代还没有现代玻璃的先进工艺,苏轼有的是虚指,有的可能指类于现代玻璃的透明或半透明物质,如琉璃。

（五） 时间、空间、官职及其他符号源

时间和空间亦是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苏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创作了《自题金山画像》这首六言绝句,开篇两句便显得深沉而凝重:“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此诗写作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时年六十有四,刚从海南儋州获得赦免。北归期间,在江苏镇江看到挚友李公麟十年前给自己画的像,苏轼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与回忆。他在这幅画像前沉思,自问一生功绩何在?随后以“黄州、惠州、儋州”三地作答,这三个地方象征着他一生的漂泊流离与不屈不挠。全诗总结了自己一生身行万里、屡遭贬谪的仕途经历,语气充满自嘲。苏轼一生都在被贬,走过城市很多,这三个只是代表而已。纪昀曰:“此诗像赞,不宜入之诗集。”^[4]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反观这首诗,可谓是以诸多符号入诗。前两句,苏轼以心、木、身、舟为符号,传达了晚年

漂泊与心境的苍凉。这些符号,不仅描绘了诗人内心的失望与无奈,更反映了诗人与宋代文人共同的文化体验。这些符号保存了苏轼独特的文学记忆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是后世理解宋代文化与文人心态的重要媒介。而黄州、惠州、儋州三处被贬之地,则是空间方位地理符号,这些符号不仅记录了仕途的坎坷,更是其文学成就与人生哲学的见证。这些符号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苏轼独特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它们跨越时空,向后世传播了诗人对人生起伏的深刻感悟与豁达态度。空间又往往离不开时间,黄州、惠州、儋州离不开对应的时间节点,对别人来说,黄州、惠州、儋州只是三个普通的地名,但对苏轼来说,这三个地名也是引导研究者走进苏轼精神世界绕不开的特殊标记。苏轼被贬时间与地点对应如表 4。

表 4 被贬时间与地点对应表

被贬地点	时间范围			贬黜原因
	年号	公元	历时	
黄州	元丰二年—元丰七年	1079—1084	4 年 2 个月	乌台诗案
惠州	绍圣元年—绍圣四年	1094—1097	3 年	讥讽朝政
儋州	绍圣四年—元符三年	1097—1100	4 年	章惇使气

除了地点,官职也是研究苏轼的切入口,且官职符号性特别强。表 5 是一个简化的苏轼代表性官职履历,包含了年号起始、历时年长、对应大致年纪、对应地点。

表 5 苏轼代表性官职时间地点年纪对应表

年号	历时年长	对应年纪	对应官职	对应地点
嘉祐六年	三年	26 岁	大理评事、凤翔府节度判官	凤翔
熙宁四年	三年	36 岁	杭州通判	杭州
元祐元年	三年	51 岁	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	汴京
元祐八年	半年	58 岁	知州	定州
绍圣四年	四年	62 岁	琼州别驾	儋州

凤翔、杭州、儋州这些地名,其意义指向了苏轼游宦的经历、仕途的坎坷与文学成就的辉煌,成为后世理解其精神世界的关键。在凤翔从政伊始,便写下了《凤翔八观》;在杭州,留下了“前生我已到杭州”(《和张子野见寄》)、“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等大量佳作名句;在儋州更是如此,儋州“总共写诗 140 首,词四首,赋五篇,各类文章 47 篇。此外,还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5]。苏轼的历任官职与罢免情况是其人生轨迹和政治生涯的重要符号。这些职位的升迁与罢免,不仅代表其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化,更反映了北宋时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乌台诗案”,象征文人政治风险的加剧,而后复起,又显示其才华与影响力。这些符号背后,蕴含了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政治态度,也反映了北宋社会的政治生态与文人命运。同时,这些地名与特定的时间节点、官职和历史事件相结合,构成了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符号系统,充满了转喻和隐喻,传递着诗人对人生起伏的深刻感悟与豁达态度。

二、 苏轼诗词文化符号的结构特点

苏轼诗词蕴含着丰富的符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苏轼诗词中,符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文化内涵,还在于它们在文本中的结构特征。苏轼诗词中意象符号的结构特点鲜明且

多样,可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生态位定义

生态位是指一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占据的特定位置及其与相关物种之间的关系,涵盖物种的栖息空间、资源利用方式及与其他物种的相互作用等。它不仅指出物理空间概念,更强调物种在群落中的机能作用和地位。由表1和表2可知,苏轼诗词自然界符号很多。“巢根白蚁乱”(《和赵景貺》)、“开门野鹤飞”(《中隐堂诗》),这是动物生态位。“香风过莲蕊”(《七月一日出城》)、“缕橙茱萸葱”(《元修菜》)这是植物生态位。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从诗描绘的景象,可以看到各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独特位置和相互关联。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大多数生物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态位置。桃花、蒌蒿等植物占据特定的生长空间,利用阳光、土壤等资源,为生态系统提供基础生产力。鸭作为水禽,对水温变化敏感,成为“春江水暖”的先知,反映了其独特的生态位和对环境的适应。食物来源地栖息地有竹林、春江、满地、江中等。桃花作为春季开花的植物,吸引传粉昆虫,为生态系统提供食物和活动空间。鸭为水禽,捕食水中的小鱼、昆虫等,同时也是生态系统中的指示物种,对水质变化敏感。竹子为桃花提供遮荫和保护,江水滋养着岸边的植物和动物。这种复杂的生态关系体现了自然界的智慧与和谐。而河豚的出现,预示着食物链的进一步复杂,展现了不同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相互依存和制约。蒌蒿、芦芽与河豚关系又十分密切。据“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记载:长江边土人“但用蒌蒿、荻笋即芦芽、菰菜三物”烹煮河豚,觉得此三物搭配最佳^[6]。王世禛《居易录》卷十三:“蒌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东用羹鱼……可见坡公无一字无来历也。”^[7]整首诗通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生态系统中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位的独特性。该诗符号感强,定位清晰,从整体构图看,由高(竹外)到次高(桃花),由低(蒌蒿)到次低(芦芽),由江面(鸭)到水底(河豚)。

(二) 符号选择与意义传达

符号承载着意义,意义的传达依赖于符号。“符号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8]苏轼巧妙地选择自然景观、春夏秋冬及物品等作为符号,通过凝练的形象和独特的文字表达,传递出深刻的情感和哲理。《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赤壁之战的场景成为历史符号,传达出对英雄人物敬仰和对历史变迁的感慨。《水调歌头》中的“月”意象象征什么?“月魄诗魂解人生。”^[9]“天上宫阙”符号具有多重意义,如高远神秘而美好的理想境界、摆脱尘世束缚的自由空间、精神上的归宿、对人生无常的感慨和思考、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and 好奇、政治理想的追求等。这些符号的运用,丰富了诗词内涵,使读者能够共鸣并领悟其中蕴含的情感与思想。苏轼诗词二十多次出现麋鹿,这些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念我山中人,久与麋鹿并”(《送吕行甫》)、“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饮酒》)。苏轼诗歌里的麋鹿,既客观描绘麋鹿状态,又借典故讽时事,更以鹿抒情,寄寓隐逸之志。他运用麋鹿渲染环境,铺垫主题,更以之自喻,寻求仕途与隐逸间的精神超脱。苏轼的写鹿诗,是其出仕与归隐间心灵归宿探索的写照。其一是自然与野性的象征。在苏轼的诗词中,麋鹿常常作为自然与野性的象征出现,它们隐逸于山林之间,享受着无拘无束的生活。如“麋鹿隐丰草”“岂羡玉勒鞿”(《二月十六日,与张、李二君游南溪》),流露的是作者对自由生活的满腔渴望,以及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思想。其二是隐逸与超脱的象征。苏轼在《赤壁赋》中以“侣鱼虾而友麋鹿”表达了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对超脱世俗束缚的追求。麋鹿作为隐逸、清闲、超脱世俗的象征,常被苏轼用以自喻,表达他对自由自在生活的渴望。这种隐逸与超脱的象征意义,贯穿于苏轼的诗词创作中,成为其人生哲学的重要体现。其三是清高与孤傲的崇高象征。

苏轼诗歌里,麋鹿常被赋予清高与孤傲的深刻内涵,它们仿佛是大自然中特立独行的精灵,坚决不与世俗的尘埃同流合污,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一片净土,保持着那份难能可贵的独立与尊严。

山中麋鹿意义繁多,水底游鱼也是如此。笔者统计,苏轼诗歌里 216 次写鱼,鱼种类繁多,不仅映射着社会人生的多元,更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成为苏轼笔下不可或缺的文学符号。苏轼深谙中华鱼文化的精髓,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触觉,将仕途的起伏跌宕巧妙地融入鱼意象之中,赋予其鲜活的艺术生命。在他的描绘下:有的鱼沉稳内敛,仿佛智者一般远离尘嚣,深谙避祸之道;有的鱼则张扬高调,如同无知者一般缺乏自我保护,直至灾祸降临仍浑然不觉。鱼意象既是儒学智慧的生动体现,又蕴含着庄学追求逍遥自在的哲学思想。“苏轼也是鱼,是一条不断被敲打の木鱼,不断被炒的鱿鱼,也是一条快乐的鱼,在生命空间中,在生活的海洋里履险如夷,乐以忘忧,快乐地游走。”^[10]

(三) 能指和所指、概念和隐喻

语言符号学理论认为:能指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如声音、文字等,是我们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形态;所指则是符号所表示的具体意义或概念,它隐藏在符号背后,需要通过符号来传达。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任意的,创作时临时起意,作者比较随意,没有自然或必然的联系;第二种是约定俗成的,和群体与民族习俗有关。这两种关系体现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社会性。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了语言符号的基本单位,是语言学、符号学和语义学等领域研究的重要概念。在这个理论里,有三个词语要注意,即符号、客体和解释义。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载体,用于代表或指示某种事物、概念或意义,是信息传递的基本元素。客体指被符号所代表或指示的对象,可以是具体的物体、事件,也可以是抽象的概念、思想等。解释义是对符号所传达意义的阐释或理解,是符号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解读。三者关系结构模式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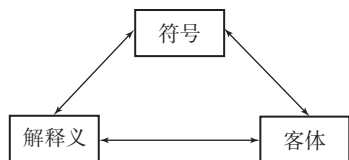


图1 符号、客体和解释义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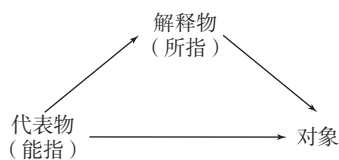


图2 解释物、代表物和对象的相互关系

同样解释沟通模式,还可以由解释物、代表物和对象物三个元素构成,如图 2。其中解释物是需要被解释的内容,代表物是传递这一内容的媒介,而对象则是接收并理解这一内容的个体或群体。图 2 中,解释物位于顶端,它代表了需要被解释或传达的概念、思想或信息。在符号学中,这通常被称为“所指”,即符号所代表或指向的实际意义。在这个情境下,解释物是被沟通和理解的核心内容。代表物位于三角形的左下角位置,它作为解释物和对象之间的媒介或桥梁。在沟通或解释过程中,代表物可能是一个符号、语言、图像或其他形式的表达,用于传递解释物的意义。它是解释物与对象之间建立联系的关键。对象物位于右下角,箭头的终点,它代表了接受解释或信息的个体或群体。在符号学的语境中,对象可以理解为信息的接收者或解释者。在这个三角形结构中,对象通过代表物来理解解释物的意义,从而实现信息的传递和理解。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经典理论之一是符号的“三位一体”性质,也称作符号三分法。该理论认为,任何符号的构建都离不开以下三个核心且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其一是媒介关联物,它作为符号的物质载体或表现形式,是符号得以存在和传播的基础;其二是对象关联物,它指的是符号所指向或代表的具体事物、概念或情境,是符号意义产生的源泉;其三是解释关联物,它涉及人们对

符号的理解与解释,是符号意义被接收者所认知的关键环节。符号本身、它所代表的对象,以及人们对这一符号的解释或理解是密不可分的。

认知语言学 and 符号学关系密切,近些年讨论激烈。有人认为是从属关系,有人认为是平行关系。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即为概念隐喻理论。概念隐喻理论由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此理论认为,隐喻是一个系统性的映射过程,它从一个具体的概念范畴转向一个抽象的概念范畴,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思维工具,而绝非语言的装饰或修饰手段。概念隐喻可划分为三大类别: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的语言、思维及文化中。概念隐喻理论阐述始源域至目标域的系统映射,涉及深层认知,促进抽象概念直观表达,揭示隐喻性思维,强调相似性映射,是理解认知与语言的关键视角。映射不限于单个词语或句子,而涉及更广泛的概念范畴,该理论和符号学的“能指”与“所指”,哲学中的“存在”与“本质”,均为人类连贯经验的结晶。七律《游庐山,次韵章传道》,以庐山的雄伟景观为背景,通过细腻的笔触,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世俗名利的淡泊。开头“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强调在自然中寻求心灵自由的重要性,激发了不受约束的“野性”。“纵壑鱼”本身是被指代或描述的对象,即能指。而它所象征或代表的深层含义,如身处顺境、自由自在或身心自得的状态,则是所指。还有“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迁居临皋亭》)、“囊空不办寻春马”(《和董传留别》)也是这种情形。“一蚁”与“寻春马”各自承载着独特的隐喻空间。在这一理论架构下,本体扮演着目标域的角色,而喻体则充当始源域。两者相互映照、彼此依存,犹如地球的两极或硬币的两面,目标域与始源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关联,它们共同织就了概念隐喻的空间关系网,“一蚁”指自己,“寻春马”指他人。如表6。

表6 目标域与始源域空间关系表

例子	出处	目标域	始源域	空间特点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迁居临皋亭》	(一)蚁	因贬谪居而无定所的生活	自者
囊空不办寻春马	《和董传留别》	(寻春)马	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东西	他者

(四) 情感与哲理融合

苏轼诗词中的意象符号,不独是自然景象的直接描绘,更是情感抒发与哲理思考的载体。他以敏锐的观察和深邃的哲思,将自然万物转化为富含情感与智慧的符号,赋予其深刻的人生意义。仅有情感的抒发,诗词便显得单薄;而仅有哲理的堆砌,诗词又失去了艺术感染力。因此,苏轼将情感与哲理巧妙融合,使诗词在传达深情的同时,也富含深刻的哲理意蕴。苏轼《琴诗》以问句的形式,探讨了声音产生的根源:假若琴声自生于琴,盛在匣子中怎么没有响动呢?假若说声音在手指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其表层意是在探讨琴声产生的直观归因,而深层意蕴是在探讨事物间相互作用、依存的关系,即琴声需琴与指共同参与,喻示着世间万物之理,即往往需要主客观条件相辅相成方能显现。现实世界,明示意为第一序列。在第一序列中,我们直面的是现实本身,它是我们存在与感知的坚实基础,如同琴与指头的物理存在,无声却实在。符号世界,琴声、能指与所指共同形成的隐含意,由文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的东西为第二序列。第二序列通过一系列精心构建的“符号”来反映并解读第一序列中的现实,这些符号超越了简单表象,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与“意义”内涵,正如琴声作为音乐这一文化符号,超越了琴与指头的物质形态。琴本身不具备发声的能力,通过弹奏这一行为,才产生了琴声。琴声的真实来源并非琴或指头单一存在,而是二者互

动的结果。正如图 3 归纳的那样,该诗深刻揭示了符号与现实之间动态平衡与相互依存的哲学思考,引导我们理解事物本质与表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微妙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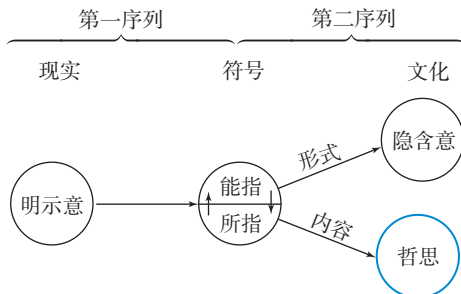


图3 符号意义导图

再如《题西林壁》,以文字为符号,展现了诗人对庐山现实的多元感知。从横看到侧观,庐山呈现出岭与峰的不同面貌,象征着同一事物在不同视角下的多样性。诗人通过远近高低的对比,强调了这种差异性的普遍存在。而“不识庐山”,则暗示了人们在局部视角中难以把握整体真实的困境。最终,“缘在山中”揭示了原因:我们的认知受限所处的位置和视角。这首七绝是一个复杂的复合型符号系统。正如有人评价电影:电影起初仅是现实的直接模仿,随后转变为描绘现实的语言符号工具,并最终发展成一套深刻的符号系统,用以对现实进行反思与表达^[11]。《题西林壁》也是这样,以简洁的文字,引导我们体会其隐含意,始源域是眼前的“庐山”,目标域为精神世界的深层追寻,由第一序列进入到第二序列,由空间叙事进入到哲理沉思层面,能指和所指,形式和内容,明示意和隐含意相互碰撞,使得文本愈加复杂。苏轼的其他许多作品也都具备这个特点,如《东栏梨花》《和子由浥池怀旧》《定风波·红梅》《望江南·超然台作》《临江仙·送钱穆父》《慈湖夹阻风五首》等。

好的作品能跨越时空引起人们的共鸣,就是因为其具有哲理意义。从读者接受层面看,由始源域“庐山”向目标域“深层追寻”亦为不可穷尽的话题。如《惠崇春江晚景》多年来一直被选作教材,大多数文学史、赏析书、教辅专家都说这是对春天的赞美。这是皮毛之见。长期追慕李白的苏轼,这里流露的思想情感应该更加深沉。与李白《早发白帝城》一样,苏轼是借“春江晚景”表达了“北归”的喜悦。这两首诗背景相同,同样是大赦天下;境况类似,一个是长期流放夜郎突然遇赦,一个是长期贬黜后忽然接到朝廷诰命回京任职。所以说,“诗无达诂”(董仲舒),不懂得“知人论世”(孟子),就画论画,不向目标域“深层追寻”的浅层次解读应弃之。

三、 结语

苏轼诗词的文化符号学阐释,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从符号识别到意义解读,都能助力挖掘作品深层内涵,为我们打开一扇深入理解其文学世界与人生哲学的窗户。文化符号学阐释方法有符号表意分析、结构分析、文化语境分析、受众接受分析等多种。符号对意境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景物符号能够营造氛围,可以传达情感,可以构建意象。某种境况下符号等同于意象,对诗词予以符号化分析是研究者系统而准确的路径之一。通过对苏轼诗词符号来源机制、结构特征的剖析,我们发现,无论是自然界的景物,还是社会生活的人工器物,都被苏轼赋予了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是其表达情感、传达哲理的重要载体。这些符号的运用,不仅丰富了诗词的内涵,更能使读者共鸣并领悟其中蕴含的情感与思想。同时,我们看到,苏轼诗词中的符号运用,与概念隐喻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将抽象的概念域与具体的概念域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隐喻空间。这些隐喻,宛如心灵密语,不仅细腻勾勒出苏轼丰富的内心世界,更如同一

面棱镜,折射出人类认知世界的奥秘。隐喻犹如思维深处魔法之钥,解锁了理解万物本质的密码。苏轼诗词的文化符号学阐释,不仅能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更能够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指引我们在现代社会中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张文卓. 人是符号的动物:卡西尔符号哲学思想[J]. 名家名作,2023,(34):64-66.
- [2] 孔凡礼. 苏轼年谱[M]. 北京:中华书局,2005:266.
- [3] 爱新觉罗·弘历. 唐宋诗醇[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956.
- [4]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 苏轼全集校注:第六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5574.
- [5] 王春煜,耿建华,邱达民. 东坡琼州诗文译注[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4.
- [6] 文一言. 苏东坡集[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8:95.
- [7] 曾枣庄,曾焄. 曾枣庄三苏研究丛刊·三苏选集[M]. 成都:巴蜀书社,2018:149.
- [8] 赵毅衡. 人是追求意义的存在[J]. 中国比较文学,2018(3):1-2.
- [9] 彭莱. 苏轼《水调歌头》:月魄诗魂解人生[J]. 中文自学指导,1996(1):14-17.
- [10] 杨景春. 苏轼诗的鱼意象及其美学价值[J].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22,29(6):43-51.
- [11] 陈娟. 《天注定》影片中动物形象的符号化解读[J]. 电影评介,2014(17):26-27.

Cultural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Su Shi's Poetry and Prose

YANG Jingchun

(School of Education, Sichua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Meishan, Sichuan, 620036, China)

Abstract: Su Shi (1037—1101) presents many representative symbols, such as medicine, cuisin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Beyond the aforementioned accomplishments, he devoted himself to poetry and prose, which are deemed the acme of his symbolic 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miotics, his poetry and prose are a complex system composed of multiple cultural symbols. It has its own symbolic generation mechanism, via ingenious combination, conveying abundant imagery and profound emotions, symbolizing temporal, spatial, and thematic connotations, as incisiv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universe and human existence.

Key words: Su Shi; poetry and prose; semiotics; cultural symbols

[责任编辑:王建霞]